

雪域高原的法治播种者



叶飞龙(中)援藏结束

从西藏回到金华将近一个月,叶飞龙还是会时常感到头晕、嗜睡,这是从高原回到平原后,醉氧带来的后遗症。“好像记忆力都下降了”,他笑着调侃自己。

本报记者 叶飞龙 整理
王亚

叶飞龙是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,今年7月,他身披哈达,结束了一年的援藏之行,带着藏族同胞满满的祝福回到了金华。

2022年,根据司法部推动基本解决“无律师县”问题工作要求,省司法厅积极宣传、广泛动员,全省律师行业踊跃报名。经择优推荐和司法部选拔,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到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设立分所。作为所里的青年律师,叶飞龙踊跃报名并成为浙江泽鉴(比如)律师事务所第一名派驻律师。

变黑的肤色和减下的30斤体重,是这位青年律师援藏一年最明显的印记。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在4000米海拔上发生的故事。



叶飞龙



受援人赠送锦旗



开展法律讲座

“这里需要我”

早在大学时期我就有个“西藏梦”,向往去雪域高原,不过一直没能成行。所以在得知律所要招募西藏的派驻律师后,我立马报名了。

父母亲戚得知我要去遥远的西藏一年,也支持我。于是,去年7月,满怀期待的我踏上西藏那曲,正式开始了“援藏之旅”。

那曲市比如县属于无律师县,位于怒江上游,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,海拔约4000米,地形起伏蜿蜒,高寒缺氧、交通不便,“远在阿里,苦在那曲”。

出发前,为了应对当地寒冷天气,我还特意吃胖了几斤。没想到,刚来这边,高原反应还是给我来了一个“下马威”。头痛、嗜睡、呼吸不畅、无法进食,多种症状并发,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,好不容易养起来的膘也没了。好在熬过了一周后,除了走路比较喘,其他都渐渐适应,我也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

2022年8月,浙江泽鉴(比如)律师事务所正式揭牌。原本以为当地法律需求较少,没想到揭牌第一天,“板凳没坐热”,我就接到了群众的求助。

来求助的是一名藏族同胞和一名汉族同胞,两人走进律所,什么也没说,就递给我一份资料。虽然一头雾水,但我还是翻阅起来。原来,汉族同胞是一名包工头,雇佣了该藏族同胞在工地上施工。几个月前,藏族同胞在工地上受伤,两人就该事情划分了责任,确定了医疗费等费用赔偿。

这起纠纷似乎已经结束,我又需要做什么呢?将心中的疑惑问出来后,得到的是令人诧异的回答。“写下来!”两人异口同声地用汉语说出这3个字。

原来,两人都怕口头说辞没有保障,一直没有赔付。于是我为他们拟了和解协议书,两人当场结清了赔偿款,对我道谢后离开了。

这是我到比如县接手的第一个案子,服务内容非常简单,但这件事让我更明白了,这里比我想的更需要法律服务。

刚进入工作状态没多久,疫情来了。我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了生活的住所,所有物资均向疫情防控人员订购。

“光吃饭不干活,那我来西藏又有何意义?”既然无法提供线下法律服务,那么就转变服务方式与思路,用线上服务为县政府及百姓提供法

治宣传教育、法律咨询等。最忙的时候,我一天要接50多个咨询电话。同时,我还加入了抗疫志愿者队伍,帮忙发放物资、维持秩序。从黑夜到日出,阳光洒在我身上,劳累却安心。2023年,我还被中共西藏律师行业委员会、西藏律协评为“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”。

“从尽心尽力到不遗余力”

小时候,长辈们说我一身正气,适合做律师。现在,我也确实成为了一名律师。来到比如之前,我就在想能为这里的人做些什么。解答每一次咨询、服务每一个有需求的群众。但是这个案子,让我觉得做律师不仅是完成一次任务,维护正义,更要走进群众的内心。

一天,一行藏族同胞来到律所,有老人也有小孩,其中脸上蒙着头巾的藏族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白发苍苍的藏族男人愁容满面,比划着手说了一句什么。随后,县司法局工作人员替我翻译了他的话——“我女儿被家暴了。”

原来,蒙面女子多次被丈夫家暴,作为父亲的他,不忍女儿受苦,所以来到律所求助,想要帮助女儿离婚。和以往遇到的案子一样,我让翻译人员帮我问清楚他们的诉求,按照流程为他们写了诉状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,直到我问了一句,“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?”

听到这句话的当事人父亲激动了起来,说:“他威胁我们,说要杀掉我们一家人。”说着,还给我看了她女儿伤痕累累的照片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当事人也揭下脸上一直遮掩的头巾,露出淤青的脸。

此刻我才意识到,这件事比我想的更严重。于是我重新修改诉状,告知当事人应当收集和提供的证据,最后成功帮助当事人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案件结束后,当事人父亲将我的手拉了过去,起初我以为是简单行个握手礼致谢,但出乎意料,他弯下腰,将我的手背贴在了他的额头上——这是朴实的藏区人民表示感谢的最高礼仪。

他的谢礼让我深受触动。身为法律人,不仅要用法律援藏,更要用感情援藏。

“律师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”

从我的住所到律所和司法所,需要走近一个小时,因为语言不通,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县政府司法局和各部门办公,担任政府法律顾问,

参与县政府常务会,为县政府各类公共决策事项提供法律支持,协助信访部门化解社会矛盾。

去年春节前夕,我本打算趁假期出去休息,没想到县里突然打来一个电话:“叶律师,我们这边有个案子紧急,需要你的帮助。”我立即应下,推掉了自己的行程。

一整个假期,我和县政府组成的专班都在处理这件事,我错过了春节,也错过了藏历新年。因为法律资源匮乏,比如县类似的案件大大小小有很多,我也常常伏案工作到凌晨。

以绵薄之力推动法治建设是我当律师的梦想。一年来,我为比如县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合同389份,起草比如县政府所需的33种类型合同,出具书面法律意见66份,提供普法文章6篇,普法讲座11场;受那曲市法律援助指派,参与刑事案件辩护47件,为百姓免费代写法律文书97件,提供无数次免费咨询。

援藏一年的时间过得飞快。这一年,我几乎没怎么离开过比如县,有空也只是爬一爬光秃秃的山,再看看连绵的雪。与枯燥生活不同的是,我的内心变得更充盈。离开时披在脖子上厚厚的哈达、一张“优秀政府法律顾问”证书、还有淳朴的藏族人民的感谢……我很庆幸自己作为援藏律师到当地工作,这次宝贵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海拔4000多米,距离浙江几千公里,对于“高冷”又遥远的西藏,沿海地区的人总有很多向往。那里海拔很高,踮一踮脚,是不是就能碰到星星?

叶飞龙用自己的行动去经历、去感受,得到了他自己的答案。那曲市曾被称为“全国唯一一座没有树木的城市”,做援藏律师的这一年,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法治“播种人”,播下一颗法治的种子,助力当地拥有一片法治“森林”。

结束援藏的这一个月,叶飞龙还是会经常接到那边的来电,向他咨询各种法律问题,他也总是耐心解答。记者问他,这次的援藏之行是否辛苦,他却说很顺利。在他看来,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克服,而可以克服的事情就不能算困难。

回忆这特殊的一年,叶飞龙认为这是他和西藏的一次缘分。如果还有机会,他还想和西藏再续一次这份缘。